

南宋江西散文研究

扶平凡◎著

NANSONG JIANGXI SANWE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宋江西散文研究

扶平凡◎著

NANSONG JIANGXI SANWE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宋江西散文研究/扶平凡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61-4627-9

I. ①南… II. ①扶… III. ①古典散文—古典文學研究—江西省—
南宋 IV. ①I207.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78229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郭曉鴻
特約編輯 王冬梅
責任校對 何洪超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國社科網 010-64070619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23.25
插 頁 2
字 數 358 千字
定 價 69.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010-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緒 論

宋朝立國之初，文學創作並未走上正軌，文學格局既陋又隘，文學風格既偏又狹。然自歐公奮起，文學大興。古文運動聲勢浩大，詩歌創作與唐詩雙峰並峙，詞成為有宋一代文學。而江西地區的文學創作更是異軍突起：晏殊之詞，綻放北宋詞壇報春花；曾、王與歐公師生提攜，並駕馳騁於文壇；山谷之詩宗派於西江。南渡之後，益公領袖文壇，富贍而精工；誠齋主盟於詩壇，清麗而活潑；姜夔孤飛於詞壇，清空而騷雅。同時，宋代江西家族文學，方興未艾，墨莊三劉、清江三孔、廬陵王氏、南豐曾氏、鄱陽四洪等，布撒於江西南北，可以說江西文學在宋代達到了巔峰。

宋室南渡後，江西文學繼續發展，仍然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其散文創作成就相當突出，具體表現為作家眾多、作品豐富、質量很高、特點鮮明。但面對如此豐富而有成就的江西散文創作，學人對其研究則顯得不夠。本書立足於文本細讀的基礎，兼顧江西地域文化與文學創作的關係，選取一部分作家，進行深入研究，採取依體立論的方法，深度分析其各體散文創作的特點及其所呈現出來的整體藝術特徵，以此來反映南宋江西散文的創作成就、創作特點，從而實現對南宋散文研究的深化。

一 南宋散文研究現狀

宋代散文創作極為發達，所謂“宋之文超漢軼唐”^①，“抗漢唐而出其

^① 倪樸：《筠州投雷教授書》，《倪石陵書》，四庫全書本。

上”^①。學界對宋代散文的研究也取得較大成績，但遺憾的是，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歐、曾、王、三蘇的身上，而南宋散文研究這一塊，卻是相當薄弱。尤其是後來論者相當鄙薄南宋之文，如余闕說：“……宋之盛也，則有周子、二程子、張子、歐曾之文，南遷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②明人何良俊亦鄙之曰：“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一觀者矣。”^③均認為南宋之文不足觀。“南宋散文一向不為後世所重視，後期散文尤甚。明代茅坤所稱唐宋八大家，北宋據其六，南宋竟無一人，由此可見一斑。”^④實際上，南宋散文家中能獲得評論家、研究者青眼一瞥的又以理學家居多，如陳亮、朱熹、呂祖謙、葉適等。像楊萬里的散文基本上無人問津，《四庫提要》甚至對其散文未置一詞。

諸多文學史著作對南宋散文，或是不屑一顧而直接闕割，或是蜻蜓點水而款款飛過，大多是約略地談到胡銓、陳亮的政論文，陸游、范成大的筆記，朱熹、真德秀的散文。其中，郭預衡先生撰寫的《中國散文史》是一部散文專史，對南宋散文有較深入的研究，然其涉及的作家雖多，而其筆觸則主要是放在論政言事的散文上。程千帆、吳新雷所著《兩宋文學史》是專論兩宋文學的，該書第六章第三節專論南宋前期散文的發展，主要是論述理學家的散文。第十章第三節論述南宋後期散文流派，主要論述道學派和浙東學派散文。第十一章論宋四六文，因大多數文學史對宋四六文涉及不多，因而可以說這是該書的亮點之一。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下）是南宋文學專史，該書在論述南宋前期文學時，未設專章專節來論述散文。在論述南宋後期散文時，還是著重宋末烈士和遺民作家的散文，對其他作家亦未涉及。另外，港、台研究者對南宋散文亦較少涉足。

現在研究狀況有所轉變，已有一些學者對南宋散文投入更多的精力進行研究。其中比較突出的有朱迎平《宋文論稿》、閔澤平《南宋理學家散

① 陸游：《尤延之尚書哀辭》，《渭南文集》卷四一，四庫全書本。

② 余闕：《柳待制文集原序》，柳貫《柳待制文集》卷首，四庫叢刊初編本。

③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歷代文話》第二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3頁。

④ 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頁。

文研究》、馬茂軍《宋代散文史論》、曾棗莊《宋文通論》等論著。《宋文論稿》對陸游、葉適，“蘇門弟子”、“永嘉文派”等重要作家和流派散文創作成就進行闡述，對南宋散文的評價提出自己的看法，對整個宋代散文研究進行反思。尤其是對南宋四十位散文作家的創作情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和評述，從中可瞭解南宋散文的發展脈絡。《南宋理學家散文研究》是南宋理學家散文專論，主要探討了陳亮、呂祖謙、朱熹、陸九淵、葉適等人的散文藝術特色及其成因，並對各家散文主張、創作風格作了比較準確的概括。《宋代散文史論》設有一章專論南宋散文流派，分別論述了永嘉文派、江湖文派、閩學文派、南宋江西散文、宋代嶺南散文三家、宋元遺民散文。《宋文通論》是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宋文的專著，具有高度的原創性。該書系統綜合地論述了宋文發展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宋文風格形成和發展的原因，宋人論文及其分歧，宋文總體特徵及其對宋代其他文體的影響，宋文對元、明、清各代文體的影響以及宋文的對外傳播等；並且還依體立論，對宋文諸體予以專門論述，全書論述不乏創見和亮點。《宋文通論》以斷代文體為切入點，進而探索文學創作規律，也有很高的理論創新意義，這是一部頗具創新性與開拓之功的力作，他將宋文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不過限於體例，該書主要是以斷代文體為切入點通論宋文，所以對於單個作家來說就不成系統，消解了單個作家的創作個性和特點。該書在選取作家時雖儘量照顧到南宋作家，但相對而言南宋散文研究仍顯得較為單薄。

綜上所述，南宋散文研究到目前為止，仍是整個宋代文學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有著極大的研究空間和研究價值。南宋散文固然不為後人所看好，但退一步來講，即使南宋散文沒有價值，也不能說明對南宋散文的研究就沒有價值。因此，對南宋散文的研究就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其中，為我們現代文學，特別是散文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二 南宋江西散文研究現狀

南宋江西散文作家眾多，作品豐富，但是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並不多。在眾多的作家中談得較多的是胡銓、文天祥、謝枋得等人。在現有論

著中，馬茂軍的《宋代散文史論》首先對江西散文設有專章研究，為開創拓荒之舉，論述也比較深入，尤其是對周必大的散文有較深入的論述。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中對楊萬里散文未作闡述。實際上楊萬里的散文，不僅數量多得驚人，而且取得較高成就。楊萬里的散文創作，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情感深厚，文備眾體，藝術水平很高。該書未選擇楊萬里散文作為研究對象，恐怕仍是受前人成見之影響。自南宋後期始，歷代評論者對楊萬里散文幾乎都是視而不見，皆集中力量研究其詩歌。筆者分析個中原因，以為不外乎以下四點：一是楊萬里詩名掩蓋了文名。二是自南宋以後，理學占據思想的統治地位，楊萬里雖然撰有《誠齋易傳》，且曾與《程氏易傳》並刊以行，但是《誠齋易傳》引史證易的研究路數與朱熹相異。楊萬里散文主要是文士之文，而非理學家之文，其散文語言優美，講究修辭，不同於理學家文章的質直，因而在理學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不受重視。三是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但四庫館臣對每個作家的評論並非皆能恰如其分。很多人在進行古代文學的研究時以《提要》為指南針，因為《提要》對其散文未置一詞，於是楊萬里散文便鮮有人問津。四是不可否認的是楊萬里的散文成就與北宋的歐、蘇等人相比還是有差距的。現代研究中，張瑞君《楊萬里評傳》為大陸第一部全面研究楊萬里的著作。該書不但對誠齋詩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研究，而且對他的哲學、政治、人格等方面作了認真的探討，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對其散文創作進行了較為深刻的論述。

現在博士、碩士研究生已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力軍，就江西文學來說，家族研究有《南宋四洪研究》（武漢大學）；個案研究有《周必大研究》（浙江大學）、《周必大年譜》（四川大學）、《劉辰翁研究》（四川大學）；學派與文學的研究有《象山心學與文學研究》（四川大學）等；從地域文化、文學角度來探討的有《宋代文化地理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宋代江南路文學研究》（復旦大學）、《宋代江西文學家的地域分佈及其文學影響》（江西財經大學）、《南宋中後期上饒一玉山詩人群體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等。

另外，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是一部地域文學史，它對

江西地區自古以來的文學發展、創作成就作了一個系統的論述，時見新意。但對於南宋江西散文的研究則著墨不多，只選取了汪藻、周必大、胡銓、王庭珪、文天祥、王炎午、謝枋得等五人，滄海遺珠甚多；限於體例，其研究亦不夠深入。

至於有關南宋江西散文研究的專著，至今還沒有一部問世。在單篇論文中，對於楊萬里散文的評價以王奇珍《論楊萬里散文的散文與駢文》較早，作者較全面地評價了楊萬里的散文成就。對胡銓、王庭珪、謝枋得等作家的散文已經逐漸有人進行研究，然成績不是很突出。至於汪應辰、劉過、曾豐、姚勉、馬廷鸞等作家的散文則仍未見有人研究。因此，可以說現有的研究與南宋江西散文的成就相比是很不成比例的，還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 研究的範圍、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的範圍、對象

（1）本書的“江西”，是指今日之江西省所轄範圍，即大致包括宋代除興國軍之外“江南西路”，江南東路的饒州、信州、南康軍和徽州的婺源。具體說，是包括饒州、信州、江州、南康軍、洪州、臨江軍、瑞州（筠州）、袁州、撫州、建昌軍、吉州、贛州（虔州）、南安軍及徽州之婺源。或曰：南宋之江南西路，不同於今日之江西省，若把今日江西之南宋時期的散文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是否扞格不入？筆者以為，只有婺源屬於徽州文化，與整個江西文化有所差別，其他的地方則與江西主體文化相通，因為“江南東西路，其風俗文化頗為相近，《隋書·地理志》所謂‘豫章之俗，頗同吳中。……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頗同豫章’。特別是江南西路以及靠近西路的饒州、信州、江州（宋屬江南東路）等風俗最為接近”^①。

（2）所謂的江西作家，主要是指占籍於上述這些地區的作家，不包括寓居與經過江西的作家。其中有一個朱熹的取捨問題，朱熹占籍徽州婺

^① 呂肖奧、張劍：《兩宋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學》，載《江海學刊》2007年第5期。

源，婺源現在又劃入今天江西省。但是朱熹生於福建，長於福建，在福建的活動時間超過六十年，並自稱“建人”。他是“閩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其學術活動主要在福建。陸學被稱“江西學”，而朱熹與陸九淵，頗多相異之處，職此之故，本書不將朱熹納入研究範圍。

(3) 題目雖擬為《南宋江西散文研究》，但本書的重點不是江西地域與散文關係之研究，重點是對江西地區南宋時期的散文進行研究。當然，既是同一地域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對散文進行地域文化的觀照。

(4) 關於“散文”概念，有很多種說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茲不展開論述，僅參考陳必祥先生《古代散文文體概論》的論述^①。“散文”一詞最先由周必大提到。《鶴林玉露》引周必大“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一語^②。可見周必大所說散文是與韻文、駢體文相對的概念。韻文包括詩、詞、曲、賦，駢體文是以駢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和聲律的一種特殊文體。因此除了韻文與駢文外的文章，如論、記、碑、誌、奏啟、序跋、書信等，無論帶有文學性還是不帶文學性都稱作“散文”，這是狹義的散文概念。廣義散文，是與詩歌相對而言，它包括散體文、駢體文、賦體文。本書的“散文”概念取廣義的散文，但是限於時間和精力，僅選取散體文作為研究對象，暫不包括駢文、韻文、賦等。另外，限於時間和精力，頗可稱述的筆記散文如羅大經《鶴林玉露》、曾敏行《獨行雜誌》、吳曾《能改齋漫錄》、洪邁《容齋隨筆》等，歷史散文如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等，以及周必大的日記等均未涉及。

(二) 研究方法

熊禮匯教授在《先唐散文藝術論》中所言，“多年來，在古典散文藝術研究中，存在一個較為突出而又不易察覺的毛病，就是不能真正從中國古典散文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探尋其藝術發展規律。許多事實表明，古典散文藝術研究要有所改觀，古典散文研究者必須轉變觀念，改進方法。”^③ 因此我們在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不能犯本末倒置的錯誤，否則就

① 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

②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7頁。

③ 熊禮匯：《先唐散文藝術論》，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

“不能真正從中國古典散文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探尋其藝術發展規律”。本書在研究中所採取的方法是，首先，立足文本，努力細讀文本，在讀懂文本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閱讀所得來進行研究，盡可能不犯先入為主的錯誤。在閱讀文獻的基礎上，知人論世，避免鑿空立論，力爭做到觀點妥帖。其次，努力處理好宏觀與微觀、整體與個案的關係。努力從宏觀上把握南宋江西文學發展的原因、宋代江西作家總體上所呈現的文學思想，以及整個南宋江西散文所具有的特點。從微觀上分析眾多的南宋江西散文作家各自的作品，探討其特點和成就。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將採取以點帶面的研究方法。在所選取的作家中，以成就較高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胡銓、楊萬里和周必大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對部分作家散文創作略作考察，少量作家散文則選取較有特點的某一文體、某一方面進行闡述，不作面面俱到的闡述。

本書在論述散文創作時，一是採取“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元模式來論述。內容與形式（或曰思想性與藝術性，或曰道與文）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因為“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①，一篇優美的散文，必然是深刻思想與完美形式的統一。在中國古代，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文道觀，一般都強調“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如《周易》的寫作目的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②，韓愈強調“所能言者，皆古之道”^③，周敦頤亦認為“文所以載道也”^④。文章寫作的目的是載“道”，因此，對思想內容的闡釋就是本書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⑤，即聖人必須通過“文”來闡明“道”，必須通過“文”來傳播“道”。韓愈亦云：“人聲之精者為言，

① 郝經：《原古錄序》，《陵川集》卷二九，四庫全書本。

② 《周易正義·系辭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6頁。

③ 韓愈：《答尉遲生書》，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2頁。

④ 周敦頤：《周元公集·文辭》卷一，四庫全書本。

⑤ 劉勰：《原道》，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頁。

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①即便是排斥“文”的道學家，也無法拋棄“文”，如周敦頤就認識到“文”的重要性，因而在闡述“文所以載道”這一觀點時，又不忘說：“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②他們皆認識到離開了“文”，思想的闡發與傳播就受到極大的限制。既然“道”不離“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那麼文章要能更好地傳道，就必須講究創作藝術。因此，文學研究不可忽視“文”，因而對散文的藝術形式、藝術特色進行深入探討，就是本書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採取依體立論的方法來研究。古人散文創作非常講究“體”，楊東山（長孺）曾說：“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昆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③因此，本書根據古代散文創作的實際情況，不採取以表達方式將散文分為記敘文、議論文、抒情文等的做法，而是採取依體立論的方法，大致按照奏疏文、序記文、碑誌文、題跋文、書信文等來論述。因為採取以表達方式劃分來研究作家散文，則消解了作家各體散文的特點；而採取依體立論來研究，雖顯得有些瑣碎，但相比較而言，能更符合作家的創作實際，能更好地展示作家的創作特點。

① 韓愈：《送孟東野序》，《韓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4頁。

② 《周元公集·文辭》卷一，四庫全書本。

③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64頁。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章 南宋江西文學發展諸要素考論	(1)
第一節 南宋江西的科舉	(1)
第二節 南宋江西的儒學	(14)
第三節 南渡江西的作家	(21)
第四節 宋代江西的文學家庭	(30)
第五節 北宋江西的文學成就	(42)
餘論	(55)
第二章 南宋江西散文綜論	(57)
第一節 宋代江西的文學思想	(57)
第二節 南宋江西散文作家梳理	(75)
第三節 南宋江西散文創作分期	(83)
第四節 南宋江西散文創作特點	(89)
第三章 胡銓散文研究	(107)
第一節 奏疏文	(107)
第二節 書信文	(115)
第三節 序跋文	(121)
第四節 記體文	(129)
第五節 雜論文	(132)
第六節 碑誌文	(134)

第七節 胡銓散文特色	(138)
第四章 楊萬里散文研究	(146)
第一節 論說文	(146)
第二節 記體文	(157)
第三節 序跋書文	(168)
第四節 碑傳文	(182)
第五節 楊萬里散文特色	(192)
第五章 周必大散文研究	(205)
第一節 文學思想	(205)
第二節 奏劄文	(210)
第三節 書劄文	(220)
第四節 題跋文	(227)
第五節 序文	(237)
第六節 記體文	(244)
第七節 碑誌文	(247)
第八節 周必大散文特色	(257)
第六章 南宋江西部分作家散文略論	(264)
第一節 王庭珪散文	(264)
第二節 汪應辰散文	(277)
第三節 陸九淵散文	(291)
第四節 劉辰翁的記體文	(308)
第五節 文天祥《指南錄》詩序	(322)
附錄	(333)
參考文獻	(344)
後記	(356)

第一章 南宋江西文學發展諸要素考論

南宋江西文學成就巨大，必有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因素，深入探討促進文學發展的各種要素，對我們更好地理解宋代文學創作以及對今天文學創作將大有裨益。在這些社會文化背景中，有很多與文學發展有著直接的關係，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俗等因素對文學的主題、題材、體裁、風格都會產生重要影響。而對於南宋江西地區來說，如下要素則是非常重要的：科舉考試、儒學研究、宋室南渡、宋代江西文學家庭、北宋江西文學成就，這些要素都會直接對江西地區文學創作產生促進作用。因此，本章將深入探討這五個要素與文學的關係。

第一節 南宋江西的科舉

中國文化發展到宋代達到了高峰，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① 鄧廣銘先生亦曾指出：“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達於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後的元明之所不能及。”^② 楊萬里曾經對宋朝開國以來文化之發展給予高度評價：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御統，清一文軌。真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於神宗，厲

①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頁。

② 鄧廣銘：《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載《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

精天網，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名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①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羣小，崇姦紂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②。

由此可見，楊萬里對宋朝高度繁榮的文化簡直是頂禮膜拜，讚歎不已。宋代文化的發展能夠達到封建社會的高峰，科舉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因為宋代科舉門檻很低，“國家舉場一開，屠販胥商皆可提筆以入”^③，所以科舉對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更是影響巨大。而地域文化視野下的江西，更是異軍突起，被稱為多士之邦：

大江之西，國朝以來異人輩出，人物之盛甲於東南。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為天下倡，而後之學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斷喪萎荼之餘習斬焉不存。而後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為一王法，則歐陽公實啟之也。臨川王文公，雖其所為有戾於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揚氣象。若夫南豐曾夫子以辭學顯，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劉公道原則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體，窮歷代之端緒，遷、固而下，千有餘歲，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則實筠人也。至其他能以詩名如謝無逸、潘邠老、汪信民諸公號江西詩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數，江

① 楊萬里：《三山陳先生樂書序》，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第6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315頁。

② 楊萬里：《杉溪集後序》，《楊萬里集箋校》第6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350頁。

③ 周必大：《送黃秀才序》，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3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頁。

西蓋多士矣。^①

推動江西文化發展的因素固然有很多，其中江西人非常重視科舉，積極參加科舉考試，是江西文化發展的重要助推器。

一 南宋江西科舉盛況

先看看整個宋代江西科舉之盛況。宋朝進士總額為3萬餘名，而據清末光緒年間《江西通志》記載，兩宋江西進士有5442名之多（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約占宋朝進士總額的1/6^②，這是江西人中進士的情況。而作為科舉第一名的狀元情況又如何呢？據統計，宋代江西狀元共12人，其中北宋5人，南宋7人。^③而南宋時的江西科舉情況，更是幾乎可以用盛況空前來形容，各種統計數據固然直觀，卻不如作家筆下的描述生動，如楊萬里曾記載江西科舉之盛況：

宋中興以來，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眾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姪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為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產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歟？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臨，紹興十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弓冶奕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來，一家而已。^④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比興，能士之羣

① 倪樸：《筠州投雷教授書》，《倪石陵書》，四庫全書本。

② 陳志雲：《科舉制度與兩宋贛文化》，載《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21卷第1期。

③ 參見胡兆量、阿爾斯朗、琮達等編《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歷代狀元籍貫地詳表》。

④ 楊萬里：《靜庵記》，《楊萬里集箋校》第6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141頁。

試於有司者，至於盈數，蓋有過之無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廬陵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曾，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尤者也，至於週年收科相望者，羅氏七人，曾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氏若加少，然二氏者或散而羣從，至於同產三人相繼收科者，惟羅氏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又盛之尤者矣。然仕又盛者，羅氏之一人今爲二千石，曾氏一人爲二千石，一人今爲右史，而孫氏則一人爲二千石，一人爲天官小宰，豈不又盛矣哉？^①

一個家族中幾人登進士科的情況在江西竟然如此之多，入仕爲官的級別又如此之高，則南宋江西人參加科舉熱情之高漲、收穫之豐碩，由此可見一斑。楊萬里所提到的印岡羅氏，周必大亦曾給予讚美，說印山羅氏，“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科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②，此可證楊萬里並未誇大其詞。由此可見，南宋江西科舉確實興盛。

這種科舉盛況的出現，與江西人一直重視教育，鼓勵子弟努力讀書，積極參加科舉的傳統有很大的關係。王安石說：“非讀書不足以應事。”^③“清江三孔”科舉連捷，名滿天下，與其父孔延之重視教育有極大的關係，“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賢，天下以爲盛”^④。而江西饒州甚至出現了“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⑤的局面。這說明注重教育已經成爲一種風氣，王庭珪曾說：“吾邑僻在一隅，山水亦奇絕。故人無貧富，皆喜教其子弟，

① 楊萬里：《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楊萬里集箋校》第6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307頁。

② 周必大：《題印山羅氏一經集後》，《全宋文》第23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頁。

③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9頁。

④ 曾鞏：《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75頁。

⑤ 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65頁。